

## 读《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的感想

宋献方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对现代中国学研究外行的我,通过学习加加美光行教授的论文《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了解了“地域研究”和“地域学”的区别、美国及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历史政治背景及含义,加加美教授提出了从“地域研究”上升为“地域学”的三个前提条件的主题词:为“多样性、多元性”;“主体、客体互动、互换”;“多主体时而互助、时而对立”等,为现代中国学研究提出了全新思路。这激发了我希望了解中国国内对中国学的认识及现状,在这一并介绍,在此基础上谈几点看法。

### 一. 中国国内对中国学的定义及现状

中国国内对中国学又称“汉学 Sinology”: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间的综合性学科。

研究对象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

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

学科历史: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

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

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

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成吉思汗及蒙古史》（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4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成果的基础上，19世纪初出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

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沅、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白菜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春秋左传》、《易经》、《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

繁荣期（20世纪）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

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

美国和日本汉学研究在 20 世纪后来居上是汉学繁荣的突出表现。它们的汉学研究虽然晚于英、法、德等国，但在 20 世纪以各自的优势令汉学界瞩目。美国以其雄厚的国力广集中国文物资料，网罗汉学精英，形成超过欧洲的阵容。日本以其与中国文化同源和邻邦的条件，由传统的朱子学到 20 世纪初的支那学，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学，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和学科体系。虽然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有其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汉学的发展。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有沙畹、伯希和，英国有翟理斯、斯坦因；德国有米勒、哥隆维德，美国有夏德、劳佛尔，日本有和田清等一大批汉学大家。他们以中国考古、敦煌、吐鲁番研究带动中国研究的深入。20 世纪后半期，各国都形成自己的汉学学派。将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出现一大批优秀成果。德国福兰阁及其儿子福吾康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著作，瑞典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美国卫特夫的《中国经济与社会》、法国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日本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等都是精湛的汉学论著。汉学研究的国际性合作交流，华人入籍西方从事汉学研究等，都是促进 20 世纪汉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中国国内一批大学及科研院所先后成立了中国学研究中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并且先后 2004 年 8 月及 2006 年 9 月先后召开了两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今后将每两年举办一届，并将成为各国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认识和研究中国的重要平台。

## 二.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研究当代中国，根本目的是要回答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按照加美先生倡导的“现代中国学”研究原则，应当从实际出发，走出去，从历史、文化、政治、外交、地理及环境等全面认识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研究中国发展观念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尤其是研究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独特现象，当代学者们正在热烈地讨论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问题、中国的“世界工厂”问题以及中国的软力量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中国发展最终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

发展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已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切实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是走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老路，就会出现滥用资源、不顾环境、

无限投入的严重后果,中国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对于国内的社会和谐与国际的持久和平都是不利的。所面临的发展问题,有些与制度、体制和机制不完善有关;有些与人的观念、素质和能力有关;有些与科学、技术、文化的水平有关;有些与国际环境、要素和体系有关。在不断总结中国自身改革发展经验和不断研究借鉴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对发展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总战略。科学发展观既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又把实现人民的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基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近30年来中国的发展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和取得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也是基于中国人民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的把握,乃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所作出的必然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构建一个将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程度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又是中国外交的选择,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遵循和传播新的文明观、新的发展观、新的安全观、新的合作观、新的秩序观,愿意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共同努力。

当然,把科学发展观付诸于实践、实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具体的、科学的研究。这也就为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遇,可以推动中国研究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更加证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致性,使中国学最终能够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